



■ 商务印书馆创立一百二十周年纪念 ■

《小说月报》对中国新文学的塑造

■ 杨 扬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新文学领域，虽与北京的新文化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但仍保持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。以《时事新报》为例，它一方面探讨社会主义等理论问题；另一方面，却抱着商讨而非倡导的态度。在文学领域，当时上海最重要的期刊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小说月报》。

1919 年底，茅盾受命执掌《小说月报》。由此，《小说月报》由一个充满旧文学气息的文学消遣杂志，蜕变为引领中国新文学潮流的大型文学杂志，不仅为新文学争得了最重要的发表作品的平台，而且培养了一大批新文学家，为新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改革前的《小说月报》：曾发表鲁迅的第一篇文言小说《怀旧》

《小说月报》与同时代诸多文学期刊有所区别，它不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文人自己办刊，而是商务印书馆的刊物。商务印书馆虽是民营出版企业，但其经营规模、管理方式以及文化追求，与当时一般的出版企业有所不同，很多人愿意称其为“文化出版机构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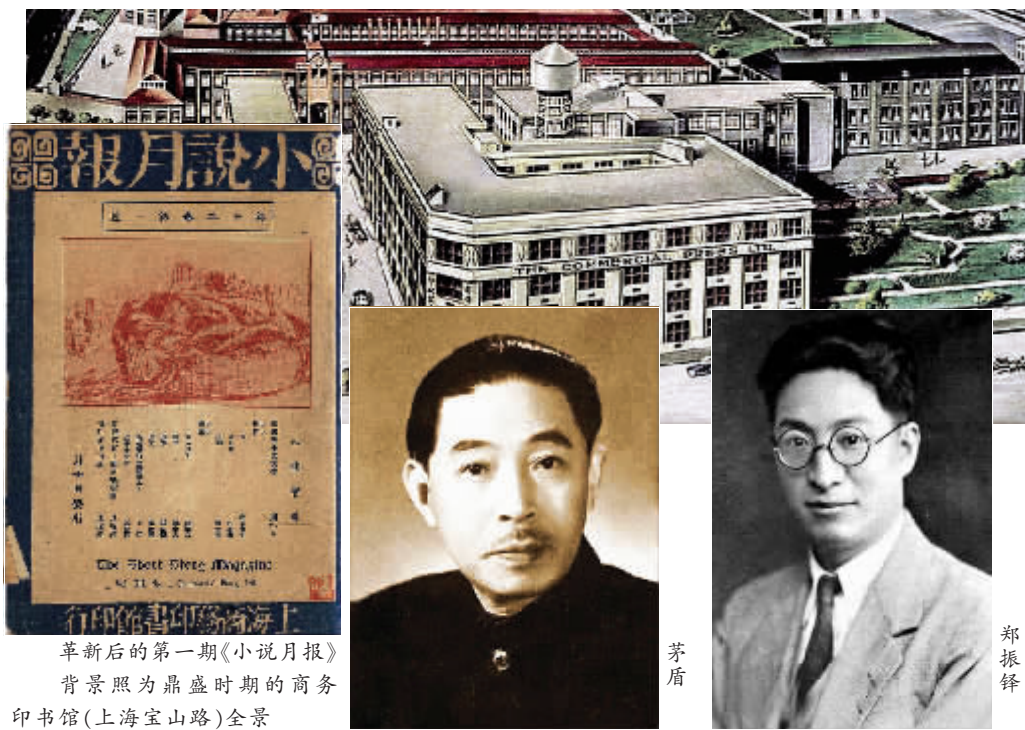
早在《小说月报》创办之前，1903 年商务印书馆就邀请著名小说家李伯元主编《绣像小说》。可惜李伯元 1906 年便病逝，1907 年《绣像小说》停刊。直到 1910 年，商务印书馆才创办《小说月报》。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前的两位主编王蕴章、恽铁樵，是这一时期文学领域的办刊高手。在这两位主编手里，《小说月报》有着不俗的表现。鲁迅先生的第一篇文言小说《怀旧》，就是在恽铁樵主编时，刊发在《小说月报》上的。

1919 年“五四”运动兴起之际，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，人们不再满足于点点滴滴的改良，而希望有一个全盘革新的文学激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文学新人沈雁冰（茅盾）被商务印书馆物色为新的主编。

茅盾在其晚年回忆录中说，1919 年底，“身兼《小说月报》和《妇女杂志》主编的王蕴章忽然找我，说是《小说月报》明年将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倡新文学，拟名为‘小说新潮’栏，请我主持这一栏的实际编辑事务。”

创立于 1897 年的商务印书馆，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，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。本月 13 日至 15 日，海内外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将相聚京城，围绕“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”主题进行研讨。时值商务印书馆创立一百二十周年之际，本报特约与会者之一，中国茅盾学会会长、华东师范大学杨扬教授撰稿，以作纪念。

——编者



革新后的第一期《小说月报》
背景照为鼎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（上海宝山路）全景

茅盾

郑振铎

批评家茅盾的“改革宣言”：推进新文学运动的发展

茅盾接手后的《小说月报》，是批评家办刊。因为茅盾和他的继任者郑振铎，在当时都以文学批评见长，两人的风格鲜明地烙在刊物上。

1921 年茅盾在《〈小说月报〉改革宣言》中，将评论栏目的改进放在第一条。1922 年，茅盾发表《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》，提出《小说月报》的努力方向是推进新文学的发展；在创作与翻译问题上，是两者并举，只有通过翻译，才可能吸收国外文学的各种技法；与现代的世界文学水准相比，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需要经过自然主义的洗礼。

茅盾还计划在 1922 年的《小说月报》上开设十个方面的栏目：一是长篇、短篇小说创作；二是西洋小说史略的介绍；三是诗歌、戏剧创作；四是文学研究；五是创作现状的讨论；六是杂论；七是海外文坛消息；八是通信；九是读者反馈；十是编辑手记。

茅盾对接手《小说月报》一年来的办刊经验总结与新年计划，都体现了一个文学批评家对当时中国新文学发展状况的判断和看法。改革版从第一期到第七期，每期打头的都是文学批评，创作则是置于文学批评的视野之中。从第八期开始，文学创作似乎放到了版面的前列，实际上还是贯彻着批评家对当时新文学的某种判断，也就是新文学要经过自然主义写实方法的洗礼，才能有一个扎实而牢固的基础。

事实上，早在 1920 年茅盾撰写的“小说新潮”栏发刊宣言中，他就描绘了欧洲文学演进的基本轮廓，即从古典主义、浪漫主义、写实主义到新浪漫主义的过程。茅盾头脑中这一欧洲文学的进化图景，很可能得自于英美文学史著作。然而，对照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现状，茅盾对于究竟应向欧洲文学学习什么仍不清晰。所以，他有时侧重写实主义，有时又偏向新浪漫主义。但从《小说月报》第八期开始，他对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倡导，显得比较明确。这一变化，与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内部意见有关。

胡适在 1921 年 7 月 22 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我昨日读《小说月

报》第七期的论创作诸文，颇有点意见，故与振铎及雁冰谈此事。我劝他们要慎重，不可滥收。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，须有经验作底子。我又劝雁冰不可滥唱什么‘新浪漫主义’。现代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，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。有写实主义作手段，故不致堕落到空虚的坏处。如梅特林克，如辛兀（Meterlinck, Synge），都是极能运用写实主义的方法的人。不过他们的意境高，故能免去自然主义的病境。”胡适的批评意见，在《小说月报》1921 年八月号的编辑后记“最后一页”中有了回音，编辑认为应该注重写实手法的学习和运用。

十二月号上，发表了日本评论家岛村抱月的《文艺上的自然主义》。在次年 4 月发表的文章中，茅盾强调自然主义小说在写实方法上的重要性，提出“依自然派的描写方法，凡写一地一事，全以实地观察为准；莫泊桑小说中的人物，多半是实在的，福楼拜做《萨兰坡》，除多考古籍而外，并且亲至该地。可知自然派的精神并不只在所描写者是实事，而在实地观察后方描写”。

(下转第二版)

■ 阅读前沿 ■

冯亚琳——君特·格拉斯与《四七社》
丁帆——俯仰天地，流恋人性
薛原——谢稚柳：两幅搁置多年的画
蒋海——元朝是否中国文化的一分子

■ 每周一书 ■



《中华民族的人格》

张元济编著
商务印书馆出版
定价：88 元

本书系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张元济先生于 1937 年编著。书中记述了程婴、任尚、子路、豫让、聂政、荆轲、田横和贯高等中国古代八位义士的故事，他们的境遇不同，地位不同，举动也不同，但都表现出至高无上的人格。藉由此书，张元济告诉国人，我们这个民族从不缺少顶天立地的豪杰，他们或重然诺、讲信义，或临危不苟、忠肝义胆，甚或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。这才是中华民族的真人格、真精神。

就在该年 7 月，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，北平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相继沦陷，抗日战争全面打响。无数国人如同本书所提及的义士，投身烽火硝烟，筑起血肉长城。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，张元济坚信，只要坚守中华民族的可贵人格，民族精神就在，国家就不会灭亡。